

· 史学理论 ·

# 新史学和新汉学： 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

王学典

(山东大学 文史哲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关键词] 新史学; 新汉学; 学术史; 社会经济史; 古史辨; 梁启超; 胡适

[摘要] 中国现代史学是同时循着两条几乎完全不同的路线一步步产生出来的。从乾嘉汉学逐步演化而来的化经为史的过程, 是其中的路线之一; 生发于“西洋史学”、对中国学术传统而言意味着炉灶重起的过程, 则是其中的另一条路线。前者是所谓的“新汉学”, 后者是所谓的“新史学”。“新史学”是指向历史本体的, “新汉学”则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历史记录的。这两条路径起初各有轨辙, 齐头并进, 但由于“新汉学”凭借深厚, 一段时间内压倒了“新史学”; 而“新史学”因为符合社会历史潮流、国际学术潮流, 又后来居上, 再立潮头。“新史学”中经“唯物史观派史学”, 如今已经开花结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新汉学”最富有象征性的学术遗产, 事实上已经归并到当今的“古籍整理”和“史料学”学科中来了。“新汉学”所主要致力的“文本考据”工作, 已变为现代学术构成中的一个部分, 治学过程中的一个初始环节; 在“文本考据”之外和之后, 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学问世界。

[中图分类号] K09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08)05-0005-21

##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New Philology: The Two Pattern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ir Fluctuations

WANG Xue-dia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Shandong, China)

**Keywords:** the New History; the New Philology; academic history; social economic history; *Debates on Ancient History*; Liang Qichao; Hu Shi

**Abstract:**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merged gradually in two almost quite different paths simultaneously. One is the course evolved from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 step by step which transformed the classics into history; the other is the course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ern history which signified a fresh start to the Chinese academic tradition. The former is the so-called “New Philology”, and the latter is the so-called “New History”. The “New History” directs towards the noumenon of history, and the “New Philology” focuses itself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from the beginning. At first, each of these two paths had its own track and advanced side by side. Yet owing to the profound groundwork of the “New Philology”, it overwheled the “New History” for a time. Afterwards, because the “New History” matched the social historical trend and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trend, it surpassed the “New Philology” and became the main tide once again. Passing through the “Materialist History”, the “New History” has now born the fruit of the studies of Chinese social economic history. Meanwhile, the most symbolic academic heritage of the “New Philology” has now merged into the “collation of the ancient classics” and “stud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nowadays. The “textual criticism” which the “New Philology” commits itself to has changed into a part of the modern academic constitution, or an initial link of the research course; besides and after the “textual criticism”, there actually exists a larger academic world.

自从梁启超提出“新史学”这一概念之后, 学术史名家们大都用这一概念来指称此后的所有史学现象、史学运动、史学形态。笔者认为, 在概述或纵论整个中国史学史时, 可以用“新史学”来

指称“20世纪中国史学”, 以与两千年来的所谓旧史学特别是二十四史相区别; 但在叙述现代史学本身时, 则不宜笼统地再用“新史学”来指称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学, 因为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

学成分复杂、学派众多、方向迥异、多元并立,难以一概而论,必须作进一步的精细分析。鉴于此点,笔者感到,有必要重新启用“新汉学”这一概念,并且认为只有在“新汉学”概念的映衬下,“新史学”方能显示出它的原始意义。<sup>①</sup>同时,“新汉学”概念的启用,也可能会使得在很长时间内被“新史学”概念所掩盖的现代史学的真实进程、真实面貌和真实构成得以部分彰显。

应该说,20世纪的最初十几年,也即通常所说的“清末民初”那一段,可能是晚近学术史上面貌最不清晰、线索最难把握的一个时期——这当然是过渡状态使然,何况这还是整个中国学术史上最深刻的一场过渡。传统的经解学术圈,颇具影响与实力的遗民学术圈,陡然崛起的新史学阵营和活跃的国粹派等,诸流并进、纷然杂陈,堪称混沌一片;为后人所盛称的梁启超的“新史学”,在当时只是其中一股声势和影响都比较大的思潮而已。并且仅就这股思潮本身而言,其中待解的谜团也所在多有,譬如,它“为何而兴”比较清楚;但它又“为何而衰”就不大清楚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可能是对“新史学”命运的最恰当的描述。但新史学究竟是像夜空中的一道闪电,稍纵即逝了,还是像暴发的山洪,注入连绵不断的江河之中了?长期以来对它的理解也同样是不得要领。不得要领的原因,可能部分源于对“新史学”性质的误解,即在“进化论”所导致的惟新是鹜的背景下,无论是时人还是后人,都把“新史学”无限制地泛化了。由于这种泛化,遂又导致更深刻的误解。譬如,“新史学”本为梁启超所提出,但自1917年胡适回国之后,特别是以“古史辨”为核心的“整理国故”运动兴起之后,胡的史学及其革命也被称作新史学;其后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又被称作新史学;与此同时,郭沫若、陶希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还被称作新史学……于是,史学一路“新”下来,一团乱麻也出现了。这些所谓的“新史学”,显然无法放入同一个史学范型中去!这里实际上牵扯着两个比较大的问题:一是所有这些标榜“新史学”的史学流派是一脉传承属于同一主体的不同阶段,还是各有源流各随因缘际会独立发展而来?二是既然同为“新史学”,为何又其趣大异,乃至互争长短,彼此不容?笔者认为,如弄不清楚这两个问题,现代史学的发展线索就永远处在模糊状态。而胡适所代表的史学潮流的属性如何认定,

则是其中的关键。

## 一 新史学与新汉学

如同学界所看到的,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中心的史学群体,从治学路数、学术渊源、为学旨趣、致知门径诸方面看,实际上与清末民初的“新史学”相去甚远,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内在关联;<sup>②</sup>与此后出现的社会经济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形同陌路。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的特征大概可以作如下的概括:<sup>③</sup>从历史观或历史本体论上看,新史学是反王朝体系或打破王朝体系的。王朝体系的最大弊端,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二十四史“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以为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sup>[1](p278-280)</sup>而真正的

① 蒋俊先生发表过一个意见:“‘新史学’一词,可区分为广狭二义,广义的‘新史学’……指所有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史学,既包括资产阶级史学,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而狭义的‘新史学’,则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命名,专指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见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14~15页)笔者认为这一界定很有道理:广义的“新史学”是一种笼统之说,而本文所说的狭义的“新史学”则指的是一种特定的史学范式。

② 《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一书还提出了下面这个论断:“‘实验主义史学’是‘新史学’的逻辑发展”,逻辑是:“‘新史学’强调‘致用’,以致产生了忽视资料建设的弊病,而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的出现,适应了‘求真’、也即弥补‘新史学’不足的需要,作者因此说:‘实验主义史学’与近代‘新史学’两者合起来,才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史学”(见该书第48页)。这个逻辑看起来颇为合理,但实际上仍有继续探讨的余地,现在看来,以胡适为代表的所谓“实验主义史学”的兴起,在任何意义上都看不到是出于“补偏救弊”的需要。事实上,这是两个并列的,起初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史学形态。

③ 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思潮的研究,下列成果可能带有较大的代表性:俞旦初《简论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史学》(《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以及《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连载于《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4期和1983年第2期),后均收入俞氏著《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齐鲁书社1995年版;[日]浮田和民讲述,郭国义编校:《史学通论四种合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其中,郭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代序言》尤值得一读。

历史不应该是“君史”，应该是“民史”，换句话说，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不是帝王将相，而是普通国民。“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者，“谓之君史”，“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者，“谓之民史”，<sup>[2] (p47)</sup> 而中国旧史“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sup>[3]</sup>，因而他们主张应写一部“普通民史”来取代占统治地位的“君史”。如果说从历史观上看，梁启超等人已完成了一场带有颠覆性的“史学革命”，乃至凿开“写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先河的话，那么，从方法论上看，新史学的主张者们则同样充当了“以社会科学治史”的首倡者。他们当时呼吁：历史学必须跨用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语言学、群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和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统计学方法等“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者，还必须借鉴伦理学、心理学和逻辑学以及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等“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的成果。他们甚至已意识到，“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也不能立”，在这“一切科学”中，“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是史学必须“兼及”者，而作为史学之“首重”和“总法”者，则是“政治学、社会学”。<sup>[4] (p676~677)</sup> 以今视昔，应该说当“社会科学化史学”在“二战”之后才成为国际史坛最重要潮流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叹服任公等人当年所具有的超越时空的、为“时下史界庸人”所难以想象的远大学术眼光。无论是历史观上的革命，还是方法论上的革命，落脚点只有一个，就是尽力把历史学纳入救世的轨道，所以，从著史旨趣上来看，梁启超等新史学的倡导者们，反对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为学问而学问”的为学立场，毫不避讳地主张“学以致用”：“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sup>[1] (p287)</sup> 在他们看来，“历史之天职”，在于“记录过去现在人群所表现于社会之生活运动与其起源、发达、变迁之大势，而纪念国民之美德，指点评判帝王官吏之罪恶”，从而“使后人龟鉴之、圭臬之”。<sup>[5]</sup> 一句话，“史学者……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我国遂不可救”。<sup>[1] (p277)</sup>

现在看来，清末民初的“新史学”，从历史观

上看，带有“反封建”的启蒙性质；从方法论上看，带有跨学科的现代性质；从为学旨趣上看，带有重致用的功利性质。从这三点看，继之而起的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核心的史学形态实在与“新史学”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因此无法共置于一个史学范畴之内。本文主张用“新汉学”这一概念来指称胡、顾、傅所代表的史学范型，就主要缘于它们之间这条难以填平的鸿沟。

用“新汉学”的概念来指称胡、顾、傅为代表的民国考据学，在学术界可以说由来已久，甚至在它刚露头角的时候，人们就指出了它的汉学色彩。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被认为是继梁启超之后掀起另一场史学革命的典范性作品，正是这部作品标志着史坛进入了后新史学时代，而这部作品及其作者当时即被蔡元培、梁启超认定“稟有汉学”的特征<sup>[6] (p1)</sup>，“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sup>[7] (p434)</sup>，且有清儒“正统派遗风”<sup>[8] (p6)</sup>。继之而起的“古史辨”派，则更加强了这一“汉学”特征，并使清儒的“正统派遗风”愈演愈烈。正是根据这一点，张荫麟在1929年就明确指出，民国六七年后兴起的是“新汉学”<sup>[9] (p191; p195)</sup>，与梁的新史学截然不同。钱基博也据此指出，当时治“古学者，益得皮附科学，托外援以自张壁垒，号曰新汉学，异军突起！”<sup>[10] (p17~18)</sup> 有学者当时甚至认定，“整理国故”运动和“古史辨”运动，“实在是一种旧的运动，他的开始一直要回溯到十七、十八两世纪间极为兴盛的‘汉学’家……可惜的是，公元一千八百年后，这种……运动随即完全停止。不过到了最近，他又开始复活，这是因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出版……胡适博士和曾经留学西方的其他学者，在研究史学方法方面发表了许多著作，顿使这种运动骤添一种新的力量”。<sup>[11] (p310)</sup> 这种把“古史辨”运动视为“乾嘉汉学运动”的继续的观点在民国年间十分流行，如林同济认为“古史辨”是“上乘清代三百年考证传统而推波助澜”的运动，<sup>[12]</sup> 周谷城则说：“疑古辨伪之风”，“殆可视为乾嘉以来考证风气的继续”。<sup>[13] (p326)</sup> 而最典型的论述来自作为顾颉刚疑古活动主要助手的董书业：“五四运动的考证学称为‘新汉学’”，“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化的主流仍始终是向着‘朴学’一条路线发展的”，而且这条线是明末以来的继续，“明末以来，一般学人厌弃理学的空疏，转向经学考据的途径，直到‘五四’以后的整理国故运动，都是一条

线上的物事”。童书业还明确指出，“新汉学”和“朴学”，所指都是“文献考据学”。<sup>[14] (p777-780)</sup> 待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由胡、顾所煽起的这种考据风气则登峰造极，故时人批评说：“汉学之焰，至今盛张（托于科学方法及考古学），毒也弥甚。”<sup>[15] (p206)</sup> 具体表现就是，“各大学研究所及中央研究院皆尚考据之风”，而“今之业考据者，比乾嘉诸老尤狭隘”。<sup>[16] (p261)</sup> “今日各大学文科，皆习为杂碎考据”，“学风士习比清儒尤变本加厉”<sup>[17] (184-185)</sup>。在时人看来，这些人的研究选题多冷僻偏窄，无关宏旨，一个人的生卒年代，一个小故事来源的考辨，一个名词的解释，往往成为几万字长文的题目。<sup>[18]</sup> 在这种学风的裹挟下，“治史者或致力于寻求罕见之典籍文物，苟有所获，则不问事之巨细，题之轻重，旁征广引，附会渲染以为文章，考史愈专精，可读之史愈少。苟长此不革，史学殆难发展矣”<sup>[19] (p1148-1149)</sup>。邓嗣禹则称这些“新汉学”家为博物学家；说他们“致力于微观专题研究，如一人的死期，一地的勘定，一个术语或专有名词的解释，似乎论文题目越专越好。撰写论文时，作者经常花费很大气力去搜集资料，绕许多复杂的弯路去证明一个细小的问题，以此显示其专精和博识。这一类的中国学者可能受到了伯希和的负面影响”。因此“那些住在雍容威仪的北平城内，拥有查阅之便，总想撰写详尽的狭小专题论文的学者，不能称作史学家，而应称作博物学家”。<sup>[20]</sup> 再加上这些人多对清儒“非常推崇”，——而推崇清儒，“是为了推动新汉学的复兴”<sup>[21] (p60)</sup>。所以，民国时期许多人多称胡适“所领导的学派为新汉学或新考据”。<sup>[22] (p54)</sup> 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这样认为：胡适的“考据学不能不承认是新汉学的嫡派流传。他事实上是新汉学系的著名学者”。<sup>①</sup> “新汉学”可以说是民国学坛对胡适派的一个相当通行的称呼，连胡适自己看来也认可这一称谓，<sup>②</sup> 直至现在，学术史家仍将民国年间那些“业考据者”指称为“新汉学”，如许冠三先生就在他的《新史学九十年》一书中反复称这一学派为“新汉学”。<sup>[23] (p258; p470-471)</sup> 唐德刚先生在他的书中也一再断言：胡适的“中学止于乾嘉”<sup>[24] (p162)</sup>，“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的窠臼”，他最拿手的也是“我国最传统的训诂学，校勘学或考据学的方法”。<sup>[25] (p143-144)</sup> 而余英时先生则深刻揭示了胡、顾所掀起的史学革命的考据学本质。在他看

来，胡适的“史学革命”是“整理国故”的“革命”或是“考证学革命”，<sup>[26] (p172)</sup> 这一“革命”之后所建立的史学“典范”，也是考证学“典范”。<sup>[26] (232)</sup> 而正如梁启超所言：“以经学考证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谓之考证学，殆不可谓之史学。”<sup>[8] (p45)</sup> 所以，现在看来，胡的“史学革命”仍是汉学范畴内的革命，与梁启超意义上的“史学革命”迥异其趣。

## 二 新史学与新汉学之间的鸿沟

总之，新汉学不是新史学，虽然新汉学仍在广义的史学范畴之内。那么，我们这里所说的“新汉学”到底拥有哪些不同于梁氏“新史学”的特征呢？现在看来，有几点需要在这里特别予以强调：（1）如同大家所看到并早已指出的，清末、尤其是“新史学”时期，“史学界的风气，已由考史变为修史”，<sup>[27] (p245)</sup> 而五四之后，主流学坛则又由“修史”复归到此前的“考史”。矜尚“考史但不著史”的为学基准，成为胡、顾、傅时代带有笼罩性的学术风气。在这一点上，傅斯年主张可谓最烈：“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味道，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sup>[28] (p3)</sup> 他之反对著史，是他反对“疏通”，主张对材料“证而不疏”，“存而不补”，“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的必然结果。胡适教导吴晗时也持同一基准：“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让你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sup>[29] (p161)</sup> 这导致了一种推重史考、蔑视史释的学风的形

① 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文澜全集》第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需要注意的是，范这里的“新汉学”概念，指称的是从清初到五四这一阶段的“经学史”，与本文的使用有异。

② 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是这一点的明证：故他在后来的“口述自传”中说：“这篇‘宣言’是把我们研究汉学或国故的原则和方法作一番简要的和广泛的说明。”又说：“朱熹的宋学为我后来治汉学开拓了道路。”（参见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137页）。傅斯年说：史语所“确有一个责任”，那就是做“扩充工具、扩充材料之汉学”工作（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409~410页）。顾颉刚这方面的论述最多，也最明确，恕不具引。

成<sup>①</sup>，以致造成一种可以熟读《汉书》中的每一字句，却不知道整个汉代历史这种并非个别现象的出现。正如批评者所言：这些古史的整理者都是些“新汉学家”，“然而汉学帮助他们，汉学也限制了他们，他们的优越点适成了他们的终结点，他们止于校勘家了”。<sup>[30]</sup> (2) 崇尚归纳，<sup>②</sup>排斥甚至彻底拒绝演绎，是“新汉学”最鲜明的特征；特别推崇“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理论决事实”的致知门径，<sup>[31]</sup> (p45) 则是此一特征最突出的表现。此一门径，简言之，就是拒绝梁启超所强调的“公理公例”，甚至主张废弃哲学，“纯就史料以探史实”<sup>[32]</sup> (p335)，基本预设是“惟有用归纳的方法可以增进新知”<sup>[33]</sup> (p91)，认为“推论是危险的事”<sup>[28]</sup> (p3)。本来，在历史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或应用推论手段，取决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sup>[34]</sup> (p144) 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拒绝理论和演绎，除了退回乾嘉旧轨上去之外，没有其他出路，——这一旧轨的基本信条是“据事直书，是非自见”<sup>[35]</sup>（“唐书直笔新例”条），考史者自“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sup>[36]</sup>。治学素反对“空泛宏阔之理论”的陈垣，其弟子甚至在一封信中说自己的一篇文章虽“屡曾删改，仍恨涉史论之嫌，终于弃之筐中”<sup>[37]</sup> (p621)，此一厌恶史论的细节，颇足以说明当年北平的学术空气。(3) 怀抱“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治史理念。这一理念的要旨，是把学问本身看得高于一切，甚至高于政府高于社会，看得可以独立于一切，尤其可以独立于社会政治，乃至可以独立于救亡图存：“就是外面炮声连天，铅子满地，我们的机关里依然可以做大家认为无用的考据的工作。”“殉学和殉国都是个人的兴趣，个人的信仰。”<sup>[38]</sup> (p172) 这种学问至上、学问神圣、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据说发源于清儒“为经学而治经学”的精神。<sup>[8]</sup> (p80) 这一为学理念，与把历史“看作爱国心之源泉”的“新史学”，更是背道而驰了。(4) 与“新史学”的提倡者们“以社会科学治史”的取向不同，“新汉学家”们则鲜明地主张“以自然科学治史”。这构成二者之间的又一重大差异。在这一方面，大概也数傅斯年表达的最为直白。他认为：“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之工

具。”<sup>[28]</sup> (p7) 而在此之前的《〈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刊词》中，作者断言道：“语言历史学也正在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sup>③</sup> 1930年在致同人的一封解释史语所设置初衷的信中，傅更明确指出：“敝所设置之意，并非求继续汉学之正统，乃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sup>[39]</sup> (p137) 这也就是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所“高呼”的“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一样！胡适、顾颉刚、傅斯年这时均弃“社会科学”而取“自然科学”，显然是一个基本事实，尽管在程度上仍有不同。胡适们为何离开“新史学”的“社会科学路线”而走向“自然科学路线”？笔者感到，这可能和他们仍然与乾嘉时期“汉学家”一样将精力聚焦于“文本考据”、材料的搜集与整理有关。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从“社会科学”中借用“公理公例”的做法显然于事无补，——只要不触及历史本身，“公理公例”可能就派不上用场，“自然科学”特别是其中的所谓“科学方法”可能更为直接更为有用。因为他们已把这一“方法”的内容解释为“拿证据来”、“跟着证据走”，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再进一步的说，他们已把所谓的“科学方法”等同于实证方法，等同于“归纳法”，甚至等同于“考据学”了。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现代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清朝的汉学家所以能有国故学的大发明者，正因为他们用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和科学的方法”，而且，“钱大昕的古音之研究，王引

① 许冠三说：中国现代史学界一直存在着“墨守史考或空谈史释的两极化恶习”，殷海光把“史学界可哀的两极化态势”讽刺为：“一端是‘捉虱子’似地考据，另一端是‘做些吞云吐雾’功夫的解说。”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464、465页。

② 在“口述自传”的“青年期逐渐领悟的治学方法”一章中，胡适反复强调“归纳法”的重要：“考据之学，其能卓然有成者，皆其能用归纳之法”；他“青年期”所领悟的最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治学方法”正是“归纳法”；“在我当学生时代，我已学得一个基本上是归纳法的治学方法”了，那时“我的首要兴趣便是归纳法”，“那也是我第一次企图发展我自己的治学方法”。见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135页。

③ 《〈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刊词》见《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附录，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页。本发刊词的作者有争议，笔者暂从《傅斯年全集》大陆版编者欧阳哲生的看法：顾颉刚、傅斯年合作此文。

之的《经传释词》，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都是科学方法的出产品”。<sup>[40](p169)</sup>看得出来，假如“新史学”的主张者们通过社会科学的“公理公例”这座桥梁走向国际史学的新潮流的话，那么，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则通过所谓的“科学方法”这座桥梁走向“乾嘉汉学”，并通过对“乾嘉汉学”的“现代化”从而把自身的学问“现代化”。

在笔者看来，“新史学”和“新汉学”上述四点观念和方法上的差异，仅具有表层的性质，更深刻或作为本原的分歧实际上源于下面这一点，即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指向历史本体的，以胡适为代表的历史学、特别是“古史辨”则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历史记录的，前者是对历史本身的研究，后者则可以视为源远流长的“文籍考订学”在现代的延续。

梁启超在其《新史学》中，曾对历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作出过著名的三点界说：“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现象者何？事物之变化也。”<sup>[1](p283)</sup>这里所指当然是一种广义的“历史”。“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sup>[1](p285)</sup>“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sup>[1](p286)</sup>后两点所指则是狭义的“历史”，也即通常所说的人类社会的历史。通过这三点，应该说梁启超初步回答了“历史是什么”的问题。而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梁启超这里的“历史”所指，均是对象本身即客观历史本身，“进化”是历史本身的进化，“公理公例”也是历史本身演化的公理公例。包括“新史学”时期人们所关注的“君史”、“民史”、“贵族史”、“朝廷史”、“社会史”等概念，所指也均是历史本身。但胡适、顾颉刚，包括傅斯年通常所说的“历史”却完全与以梁氏为代表的“新史学”不同：他们的历史则主要是指“文献”的演变历程。如果说梁启超等人关心的是“什么是历史”的话，那么，胡适、顾颉刚、傅斯年关心的则是“什么是历史知识”的问题；如果说梁启超等人的关注点是历史本身的真相的话，那么，胡适等人的关注点则是“关于历史本身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总之，一个在本体论，一个在知识论，差异至为明显。下面，就让我们稍为具体地看一下胡、傅、顾等人是如何将“新史学”的“问题”转化为“新汉学”的“问题”的。

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胡适的“井田辨”了。1919至1920年，围绕着“井田制”的有无，在《建设》杂志上展开了一场讨论，这场讨论为胡适所

挑起。“井田制”是上古经济史、特别是土地制度史上的问题。如果置于相关社会科学理论，亦即梁启超所说的“公理公例”的参照之下，其存在应该说是无须置疑的。但胡适却在他的“历史演进观”的指导之下，把这个制度史上的问题转化为“文籍考订学”上的问题，也即把“井田制”问题转化为“井田论”问题。在他看来，“井田论是孟子凭空虚造出来的；孟子自己并未曾说得明白，后人一步一步的越说越周密”<sup>[41](p325)</sup>，从孟子开始，中经《公羊传》、《穀梁传》、《王制》、《韩诗外传》、《周礼》、《汉书·食货志》和《公羊解诂》等，构成了“一种井田论的演进史”。<sup>[42](p193-194)</sup>而且，他还从中抽象出以下四个环节为内容的古史研究的“根本方法”：(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记载，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记载；(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训，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的过程；(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sup>[42](p193)</sup>很明显，这四个环节全都未超出“文献”的范围。

在把“新史学”的问题转换成“文籍考订学”的问题方面，顾颉刚可以说比胡适走得还要远，因为正是他把“古史辨”一步步地变成了“古书辨”。<sup>[43](p213)</sup>顾在这方面不但比胡走得还远，而且还更自觉更理论化。他治古史的基本理念是“不立一真惟穷流变”，换句话说，就是暂时搁置历史本身的真伪问题，只关注记载或材料的变化或“演进”，也就是像胡适把“井田制”变成“井田论”那样，把“古史”的真相问题变成了“古史论”的流变问题。早在挑起古史大论战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顾就已经很自觉了：“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是怎样的……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举例来说，“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sup>[44](p59-60)</sup>后来他又强调说：“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sup>[45](p214)</sup>顾之所以由“古史辨”走向“古书辨”，原因就如同他所反省的：“十余年前……想一口气把中国古史弄个明白，便开

始从几部古书里直接证明尧、舜、禹等的真相。现在看来,真是太幼稚,太汗漫了……我[现在]不敢普泛的研究古史了,我只敢用我的全力到几部古书上。”<sup>[43](p273)</sup>这就难怪后人有这样的评论:“所谓‘古史辨’的工作本是从‘辨伪’开始,乃是一种史料考订工作。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只能是史科学范畴内的一个命题,用意在使人不要盲目地信从前人关于古史的各种记载,这个命题对于整理周秦两汉时代的记载古史的文献是有用的。”<sup>[46](p145)</sup>

总之,不论是胡适还是顾颉刚,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所持的主张和实践,大都未超出“文籍考订学”的范畴,包括被胡、顾二人作为历史研究“根本方法”的“所谓‘历史演进的方法’”,实质上只是以版本学为核心的史源考辨术的扩充和升级……换句话说,胡适和顾颉刚所着重处理的,其实只是传说或故事版本的翻新变异,而非故事或传说本身所著录、附着或反映的原始事实”<sup>[23](p170)</sup>。实事求是地说,他们不是不想研究“原始事实”,事实上,他们对许多“原始事实”也作了探究,但由于他们太迷信归纳,排斥“公理公例”,以致感到追求“原始事实”的努力不易奏效,干脆放弃,或推到遥远的将来,或以分工为由推给别人。总之,不再以探讨历史本身和“原始事实”为重心,而是退而求其次,仅以探讨历史文献、历史记载的变化为限,可以说是胡、顾二人共同的治学旨趣。而这一点,在傅斯年那里表现得尤为极端和彻底,这就是他所提出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为学理念。<sup>①</sup>在他看来,“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sup>[47](p308-309)</sup>“历史学不是著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sup>[28](p3)</sup>历史学就这样变成了“史料学”,成为取消了历史本身的“历史学”。<sup>[46](p144)</sup>

胡适、顾颉刚、傅斯年共同把历史研究导向文献整理,把历史学变为“史料学”,亦即变为“文籍考订学”,现在看来,这是五四时期的史学界对梁启超“新史学”的全面反动。如果说,相对于“清学”而言,梁启超的“新史学”是反动的,那么,以胡、傅、顾为代表的五四史学则是反动的反动,——它们就这样把自己纳入到“清学”亦即“乾嘉汉学”的轨道。乾嘉汉学,又称“朴学”或“考据(证)学”“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

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sup>[8](p2)</sup>“乾嘉以还,考证学统一学界”<sup>[8](p43)</sup>,“考证学以外,殆不必置论”<sup>[8](p25)</sup>。而“汉学”中的各派,无论是吴派或皖派,还是所谓的“扬州学派”和“常州学派”,它们所着力的对象则一律为“古籍”、“古书”和“古典”。所以,胡适说:有清三百年的主要学术业绩是“整理古书”,而且,“三百年的第一流学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这一方面”。<sup>[48](p177-178)</sup>这种“具有一代特色的专理在故纸堆里的清代考据之学”,之所以被命名为“汉学”,因为它是一种“专事追寻汉代经学”的“文籍考订学”。而这种“文籍考订学”之所以受到有清一代的推崇,“是因为汉代学者为我国第一批整理中国文献资料的人”。<sup>[49](p1:p4)</sup>由此看来,乾嘉汉学运动堪称是汉代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古典文献整理”运动。而以胡适为领袖的“整理国故”、特别是“古史辨”,则可以说是这一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尽管这两种“整理”运动之间有极大乃至本质的不同,但共同的特点是不出“文献”、尤其是“古典文献”的范围。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整理国故”运动视为“新汉学”运动,并认为这一“新汉学”运动与梁启超的“新史学”运动没有任何关联,从而也就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把它划归“新史学”的范畴。——“新史学”所倡导的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新范式,而“新汉学”所追求的则是一种“国故”或文献整理的新范式。<sup>②</sup>

现在看来,以胡适为代表的“业考据者”,可以说是“乾嘉汉学”与“欧洲汉学”特别是“巴黎汉

① 新汉学家大都致力于文献考订。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的作为有所不同。傅批评旧汉学限于章句训诂、文献考订,因而致力于材料工具扩充,引进自然科学方法,发掘实物资料。此为一般汉学家所不及。不过,其以搜求和处理材料为中心的工作路数,仍可视作传统汉学的延续。

② 对“新汉学”与“旧汉学”即“乾嘉汉学”之间的区别和差异,余英时已论之甚详。见《〈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载《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05年版。

学”的交光互影，流风余韵。<sup>①</sup> 不管它们取得了多少骄人的成就，也不管他们多么代表东西方学术的“正统”，但这一汉学形态绝不代表当时学术的新方向，绝不能预国际学术的新潮流，则是可以断言的。而梁启超的“新史学”则无论多么浅薄、粗糙、疏阔，却预言了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新时代的来到。

### 三 “路径依赖”与新汉学对新史学的腰斩

不过，随之而来的一个尖锐问题是，“新史学”为何被“新汉学”所腰斩？梁启超后来为何被胡适所“俘虏”？这当然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依笔者之见，这和 20 世纪中国现代史学由以形成的所谓“路径依赖”有关。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新史学”和“新汉学”在一段时间内的升降起伏。这其中必须强调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现代史学是同时循着两条几乎完全不同的路线，而不是一条单一路线一步步产生出来的。从传统经学、特别是乾嘉汉学逐步演化而来的化蛹为蛾，亦即化经为史的过程，是其中的路线之一，生发于“西洋史学”、对中国学术传统而言意味着炉灶重起的过程，则是其中的另一条路线。前一条路线的结果就是所谓的“新汉学”，后一条路线的结果则是所谓的“新史学”。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所谓“新史学”，基本上与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传统史学无缘，它的出现只能意味着中国史学传统的中断。从整个清代史学、特别是晚清史学的发展大势看，尽管它也一直在不断的调整和演变的历程之中，但这种调整和演化仍严格限制在传统学术的框架之内，而且根本看不到任何能够生成后来“新史学”的因素。“新史学”的出现严格说来是一场学术突变。学术史家公认，晚清学术界出现了两股思潮，一是经学上兴起了今文运动，二是史学上的西北史地研究很快被“西洋史地”研究所压倒。就史学的后一倾向而言，从“西北史地”研究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自然而然地过渡到“西洋史地”研究上来的。所以，“西洋史地”研究的热潮在清末的出现，完全是外力所致，是时势剧变的结果。实际上，自鸦片战争后，国人就渐渐放弃了自尊自大的心理，到了英法联军之役，外人以少数军队直捣京师，朝野震动，渐感到非接受西洋文化不足以立国，于是，一般士大夫对于西洋学术，兴趣陡增，

西学在此之后甚至也成为大众的关注。<sup>[27] (p242)</sup> 甲午战后，西学书籍、特别是“西洋史”更是成批涌入中国。<sup>②</sup> 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泰西新史揽要》，此书为“晚清所有翻译西方历史书籍中销售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sup>[50] (p597)</sup>。《万国史记》出版后也畅销一时，“读书界大概人手一编”<sup>[27] (p243)</sup>。还有一部“大受一般学者之欢迎”的《万国史纲》，当时被称作“欲知万国文明之变迁，且研究二十世纪之新史体者，不可不人手一编”。<sup>[51]</sup> 这些史籍像播下的种子一样终于要破土抽芽了：“我国史家因读了新翻译过来的西洋史书，渐感觉到西洋史籍编制的方法，史事的选择，远胜过我国的旧史学”，他们因此认为“中国传统的史学”也“大有改造的必要”。<sup>[27] (p248)</sup> 梁启超及其所代表的所谓“新史学”思潮遂应运而生。所以，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反王朝体系”的历史观，还是“以社会科学治史”的方法论，抑或是用发现“公理公例”来造福民族国家的为学旨趣，都与中国传统史学迥异。所以，新史学的出现是对中国史学传统的中断，换句话说，“新史学”完全可以看作是“西洋史”在中国的全盘移植。

与“新史学”的产生道路相反，“新汉学”的出现则完全可以说是从中国传统学术母体内，尤其是从传统经学母体内逐步演化出来的。

前面提到过，在晚清的学术变动中，经今文学的兴起，特别是成为晚清学术的主流，可以说是当时最重大的学术事件。正是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后来所谓“新汉学”的出现，这当然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化经为史的过程。周予同认为，清代复兴的西汉今文学派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今文学崛起于学术自身的原因，后期的今文学实

① 顾颉刚说：“近年来欧美日本学者对于汉学的研究，极有贡献，他们的成绩传入中国，很与国内学者以刺激，使中国的史学也随之进步”（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对欧洲汉学，特别是“巴黎汉学”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汉学”的影响与诱导，桑兵作了系统的疏理。参见其《欧美汉学与中国学者》及《伯希和与中国学术界》两文，收入氏著《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国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1896 年，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史志”目下收录的世界史译书仅有约 25 种；而顾燮光《译书经眼录》（1934 年刊本）所收录的出版于辛亥期间的史志译书已达 125 种，在数量上超过其他门类，如“法政”、“学校”、“交涉”以及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各学科，排在全书之首。



“由环境之变化”也即鸦片战争的刺激“所促成”。初始于龚自珍,发展于康有为,而下迄于崔适,则是后期的处于主流地位的今文学的演变环节。其中,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给予中国史学的转变以最大的推动,“我们甚至于可以说,如果没有康氏的《孔子改制考》,决不会有现在的新史学派,或者新史学的转变的路线决不会如此”。<sup>[52] (p519)</sup>这当然并不是说当时的学界全由“今文派”一家独霸,因为直到1923年,蒙文通还说:“近二十年间汉学的派别很多”,有主张汉宋兼治的,也有不辨别今古的……然而“最风行一世的,前十年是今文派,后十年便是古文派。什么教科书、新闻纸,一说到国学,便出不得这两派的范围”,而近“二十年间”的学术界,也只是这两派的“新陈代谢”而已。<sup>[53] (p12)</sup>时人的这一观察和感受应该说是可信的:清代汉学是作为整体向现代学术施加影响的,也就是说,如同“今文派”一样,“古文派”也同样参与了现代学术的塑造和建构。但“给予中国史学以转变的动力”的却是经今文学。<sup>[52] (p523)</sup>那么,经今文学所给予的动力是什么呢?(1)指出了经书中上古史的神话性质,即“三皇五帝”是神而不是人;(2)指出了周、秦诸子所述史事皆为托古改制;(3)开启了后来大规模辨伪的风气,他们对古文经典的怀疑,“正如当时的西方学者怀疑《圣经》,怀疑荷马的史诗,提倡史料批判,具有同样的重要性”<sup>①</sup>。在周予同看来,“直接受康有为经今文学的启示,而使中国史学开始转变的,计有三人:一是梁启超,二是夏曾佑,三是崔适”。其中,梁“使中国史学开始转变,开始脱离经学羁绊”,而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的是胡适”及其所开创的“疑古派”。没有康有为当然就没有胡适及其“疑古派”,但胡适及其“疑古派”接受的是整个清代经学即乾嘉汉学的遗产,因为“疑古派”“继承今文学的思想体系,采用古文学的治学方法,接受宋学的怀疑精神,而使中国的史学完全脱离经学而独立,这在中国学术演变史上是不能不特书的”。<sup>[52] (p628; p642; p547)</sup>这里所谓接受“古文学的治学方法”,主要是指以“疑古派”为代表的“新汉学”几乎仍以乾嘉学派的“实证方法”为基础,在当时,更主要的是指对章太炎及其“学派”考据方法与成果的承受。<sup>②</sup>在《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疑古派”的开山之作中,胡适所开列的致谢对象,全是“古文派”,其中所点出的在世学者没有康有为

而有章太炎。<sup>[54]</sup>尽管如此,“‘五四’以后的‘古史辨’运动……直接接受了今文运动的刺激”<sup>[27] (p238)</sup>,则是朗如白昼的事实。<sup>③</sup>“由今文学胎育出来,而结果却否定今文学,这便是中国现代学术界演变的历程”!<sup>[52] (p546)</sup>这个“历程”就是笔者所说的“化蛹为蛾”、“化经为史”的中国现代史学产生的本土路线,这也就是本文所说的“新汉学”的产生。

这里,似乎有必要稍稍谈一下“古史辨派”特别是顾颉刚先生在这一“化经为史”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因为在这一方面,顾颉刚看来最为自觉。<sup>④</sup>众所周知,“顾先生一生学术全部植根于传统的汉学”<sup>[49] (p1)</sup>,而汉学的重心是“五经”,于“五经”之中,顾又特别钟情于“书经”,这

- ① 齐思和:《晚清史学的发展》,《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237页。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强调说:“古史辨运动在中国近世史学史上地位与十九世纪初年西洋史家如尼泊(Niebuhr)等人,同垂不朽,都是指出了史学研究的第一步的基本工作,[是]史料的审查。”因此,顾颉刚提出的“层累的古史观”是驳不倒的”。见齐思和:《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 ② 罗检秋指出:民初国学领域流派众多,每个学派所发挥的作用也大小不一,如“章太炎学派”是“传承汉学”,“古史辨派”是“转化汉学”,尽管“章太炎派”的底色是崇信古文经学,但五四时期的人们仍采用章门话语如“国故”概念,以期获得学术文化界的认同。见罗检秋:《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7、447、453页。
- ③ 陈寅恪说:光绪年间,“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连系……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见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13页。
- ④ 顾颉刚说:“窃意董仲舒时代之治经,为开创经学,我辈生于今日,其任务则为结束经学。故至我辈之后,经学自变而为史学。惟如何必使经学消灭,如何必使经学之材料转变为史学之材料,则其中必有一段工作,在此工作中我辈之责任实重……清之经学渐走向科学化的途径,脱离家派之纠缠,则经学遂成古史学,而经学之结束期至矣。特彼辈之转经学为史学是下意识的,我辈则以意识之力为之,更明瞭化耳。”(见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五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788页。)在致友人的信中顾说:“我辈生于今日,其所担之任务,乃经学之结束者而古史学之开创者。此非吾人故意立异,乃自宋至清八百年中积微成著之一洪流,加以西洋科学之助力,遂成一必然之趋势也。”见《顾颉刚致吴康书》(1949年4月8日),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37页。

是因为,《尚书》不仅是“五经”之中地位最尊的一部经典,“是两千年来天子直到一般读书人都要读的政治和道德教科书”,更是因为只有《尚书》与历史的关系最为密切,它甚至就是历史特别是上古史本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一融化在以往所有读书人血液里的君统和道统,就主要是由《尚书》所确立,而“尧典”、“禹贡”和“皋陶谟”,则是其中的关键篇章,尤其是“尧典”,此篇可以说为读书人提供了关于上古的比较完整的帝王系统和古代制度,“涉及到中国古史的各个方面”,尤为顾颉刚一生所倾力攻治。顾颉刚在“化经为史”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说全部集中表现在他对《尚书》的清理与转化上。

对作为既是两千多年来所谓“封建”意识形态的老巢,又“关系于两千年历史至巨”的《尚书》,顾颉刚计划从四个方面,亦即君统、道统、学统和三代王制来摧毁这个意识形态的总堡垒,这就是他所说的著名的“古史四考”。摧毁君统亦即“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千古一系的是“帝系考”,摧毁道统亦即“三圣传心”、“尧舜孔孟”所传一道的是“道统考”,摧毁学统的是“经学考”,摧毁三代王制亦即中国理想的政治在夏商周、“古代为黄金世界”观念的是“王制考”,而摧毁的主要办法就是釜底抽薪、历史还原,揭出上古史是层累造成的,实际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先后恰成一个反背这一事实。看得出来,君统、道统、学统、三王政治,这些对传统社会性命攸关的意识形态内容,既不是建立在“文学”的平台上,也不是建立在“哲学”的平台上,而是立足于帝系即“历史”的平台上,因为假如没有“三皇五帝”、没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历史人物,就根本不会有所谓“黄金世界”和“道统”;没有“黄金世界”和“道统”,“封建”的意识形态就将全部坍塌,这就是“古史辨派”考辨“三皇五帝”即考辨古史的意义。一旦认定“尧舜禹”是神话传说而不是真实的古人,经书特别是《尚书》也就失去了其他所有意义而变成一堆纯粹的史料,所谓“化经为史”,就是化经书为史料,《尚书》这部曾经的“圣经”就这样恢复了它的古文献汇编的性质。<sup>[49] (p193)</sup>对《尚书》的研究也即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对历史的研究、对历史资料历史文献的研究。传统的汉学也就逸出了“经学”的范畴,成为现代史学的一种形态,特别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今天看来,如同“新史学”一样,“新汉学”无

疑也充当了中国现代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动力,这主要体现在“新汉学”推动了“史料观”的巨大变革,此一“变革”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一是极大地扩张了史料的范围;二是极大地改进了史料考订的工具;三是把固有的“文献”史料放在“历史演进观”的框架之下重新予以价值估定。——后一点最为时人所看重。齐思和在分析“文学革命”和“史学革命”为何易收大功时说:“文学史学,夙为我国所擅长,文学革命,史学革命云者,不过改革旧日之观念,至其要素,初无二致,故其改革也甚易。”<sup>[55] (p185)</sup>齐氏的感受同时也揭出了另一个基本事实:“新汉学”严格说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经学各个要素的综合和改造,除了“历史演进的方法”之外,支撑“新汉学”的诸多技术要素与“旧汉学”相比“初无二致”。从这个角度看,“新汉学”尽管取得了前不让乾嘉后不见来者的巨大成就,但与“新史学”相比,仍有相形见绌之处,——“新史学”所提供的全是此前中国学术史上所没有的东西。但这种有前途有未来的“新史学”为什么反被后起的“新汉学”所腰斩?

总的原因,如同前文所说,是“路径依赖”所致。就“新史学”而言,具体说来是否和以下几点相关:(1)“新史学”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事业,说它前无古人,是指“新史学”无论就学问还是学人而言均无法与传统对接,中国的史学传统乃至整个学术传统内部几乎没有任何能够自然顺延到“新史学”的因素,也就是说,梁启超们是在创造一种全新的历史,是在开创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学问。开宗立派,“为史界辟一新天地”,可能就是历史赋予“新史学”的使命。说“新史学”是一种没有基础和积累的新创造,这里有一个有力的佐证,这就是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之后,当时的学界曾流行过一种中国“无史”论。<sup>①</sup>梁曾说:“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sup>[1] (p227)</sup>但为何他们又称中

① 1902年1月,陈黻宸于《独史》一文中反复强调:“於乎,中国之无史。”“於乎,我中国之无史久矣。”(见《陈黻宸集》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66~568页)与此同时,曾鲲化说:“中国有史乎?何配谈中国有史乎?”(曾鲲化:《中国历史的出世辞》,见蒋大椿编:《史海探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597页)关于此一问题的透彻论述,是王汎森的《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一文,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196页。

国“无史”呢？因为他们心目中的“史”是“民史”而非“君史”，是“国家史”而非“朝廷史”，是“社会史”而非“贵族史”，换句话说，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是“史”！他们的意见是否准确另当别论，但“无史”论至少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新史学”是无学统可承的，是没有自身历史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史”。再进一步地说，“新史学”是无基础的，是平地起高楼。所以，时移势异，昙花一现之后，它只能归于消歇。(2)虽然缺乏一定的基础和积累，但如果方法得当，假以时日，“新史学”还是有可能创造出自己赖以立足的基础的。但是，在这方面，“新史学”又恰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在齐思和看来，梁氏不谙西文，他对于西洋史学的认识，不过是依据几本中日翻成的教科书，而这些通俗读物并不能代表近世西洋史学界研究的方法和理论的趋势，所以他对新史学的介绍，颇为肤浅空泛；他对于西洋人研究历史的方法，更是茫然得很。他不知道近世西洋史学是建设在专题研究之上。教科书并非专门著述，也不能代表近代西洋史学研究。专门研究是要依据史料从专题研究作起的。梁氏不明通俗读物与研究著作之别，而号召天下研究整个的通史，结果他自己用了这“治史所持之器”，并无成绩，而他人用方法来治史也不会有成绩的。<sup>[56]</sup>齐氏的分析可谓一语中的。(3)梁启超本人的多变可能也是“新史学”衰落的原因。他曾自我反省说：启超由于太无成见，所以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者，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至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由于太无成见之故，又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sup>[8](p73)</sup>作为一个学派的领袖如此，又如何吸引追随者以形成一个稳定的团队，从而锲而不舍地沿着稳定的方向做下去呢？所以“新史学”一时后继乏人，无法深入，不为无由。

与“新史学”相反，“新汉学”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了另外的特点。不同于“新史学”的白手起家，“新汉学”的凭借可谓丰矣、厚矣，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它有一个“乾嘉的底子”。<sup>[57](p115)</sup>所谓“乾嘉的底子”当然主要就是经学的底子，而所谓经学的底子当然主要就是考据学，而“新汉学家”们主要是些“业考据者”。“民初新史学的渊源是来自

清中叶所谓经史考据之学”，<sup>[57](p415)</sup>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新汉学”的学统和谱系可谓源远流长，其学术资源之雄厚，已可以说达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程度。而且，民初的这批新汉学家们读书治学的范围又大体与所谓的“乾嘉学派”重合，即主要集中在先秦旧籍上，如果说他们也兼治点清学，那是因为清学不过是对先秦旧籍的整理考订而已，通过清学而上窥先秦，才是他们的本意。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无不如此。所以，“新汉学家”们使用旧学资源简直可以说是左右采获、如鱼得水。因此，一旦具有了一定的“史”的自觉，一旦接受了新的历史观念即进化观念，他们就能够很容易地将这种旧学转化为史学。犹有进者，从崔述到柳诒徵到余英时，甚至认为乾嘉经学本身实质上就是关于上古三代的史学。崔述说：“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者也。”<sup>[58](p262)</sup>柳诒徵说：“世尊乾嘉诸儒，以其以汉儒之家法治经学也。然吾独谓乾嘉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而“诸儒治经，实皆考史”，其中所考“三礼”，“尤属古史之制度，诸儒反复研究，或著通例，或著专例，或为总图，或为专图，或专释一事，或博考诸制，皆可谓研究古史之专书”，“其他之治古音，治六书，治舆地，治金石，皆为古史学尤不待言”。<sup>[59](p747~748)</sup>余英时更明确地指出，“在考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谓‘经学’，其实主要是古史(所谓‘三代’)的研究”，“‘经学’实质上即是上古三代的史学”。<sup>[57](p533)</sup>也就是说，从乾嘉汉学到“新汉学”是一个极为自然的过程，就像蚕由蛹到蛾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样，这不过是从一个旧的阶段向新的阶段的过渡而已，这就说明“新汉学”的确是渊源有自、学有所出。“白手起家”的“新史学”与之相比，真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 四 胡适的治学偏好与新汉学运动的兴起

但是，无论“新汉学”的凭借多么雄厚，出身多么纯正，都并不必然意味着它在民初五六年间就一定能一举取代“新史学”。“新史学”之被腰斩，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胡适的回国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其中，最突出的，当然和胡适最初的治学路径选择有关。

胡适 1917 年的回国并任教北京大学，绝对是 20 世纪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文学改良刍议》于 1917 年 1 月在

《新青年》上刊出,使胡尚未归国即已“暴得大名”;提倡“白话文”和主张“文学革命”,几乎使五四前夕的胡适即已在读书识字者中无人不知,而《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则使他博得主流学术界的首肯和喝彩,他所挑起的“主义和问题”等论战及其对实验主义的不懈宣传,更使他一时获得青年导师的盛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一段空白:在解决人们所最感困惑的中学和西学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上,当时人们“渴望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旧格局,然而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几位中心人物之中已没有人能发挥指导的作用了。这一大片思想上的空白正等待着继起者来填补,而胡适便恰好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出现了”<sup>[60] (p169)</sup>。胡适的出现,标志着“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就是所谓“全盘西化”阶段,西学入中从此进入新的一波。<sup>①</sup>这个时候的胡适,可以说光芒四射,和梁启超当年所享有的那种“言论界之骄子”的地位极为类似:在西潮澎湃的背景下,胡适等于“西学”,在“科学”取得了至高无上地位的背景下,胡适又等于“科学方法”的化身,在“自由”与“民主”成为潮流的语境中,胡适还成为“自由”与“民主”的体现,总之,他在这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已足以影响世道人心,更足以转移一时学术之风气。而正如人们所普遍看到的:从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起,“胡适的治学途径自始即走上了考据的方向”,“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胡适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sup>[60] (p187; p218; p231)</sup>有人甚至作出了更具体的指认,说胡适“与清代考证学,即汉代古文学所派生的学问,不仅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完全接受了他们治学的业绩与方法”<sup>[52] (p544)</sup>。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里,谈文字,谈校勘,谈训诂,称誉戴震、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章太炎以及卢文弨、孙星衍、顾广圻这一班朴学大师且不说,此后,他还连篇累牍,在多篇文章中称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乃至把考据的方法与“科学的方法”划等号,于是,“一时间‘拿证据来’的口号满天飞,‘科学方法’一转而为‘考据学’,再转而为‘清儒家法’”<sup>[61] (p244)</sup>。“新汉学”就这样蔓延开来,再加上文史两个领域里“红楼梦辨”和“古史辨”的互相激荡、推波助澜,“考据”遂成为占主流地位的学术风气,胡适所在的北京大学尤其如此,“当时北京有所谓京派,讲切实,重

证据,为新朴学,新考据。京派主要在北大,北大以胡适为翘楚,他常说少谈政治多读书,拿证据来。表现在史学方面的是整理国故的国故学、疑古学、古史学。”<sup>[62] (p268)</sup>这种空气,流风所被,席卷学界,甚至连“新史学”的旗手梁启超都已站立不住,以至也跟着搞起考据来,“他受了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也“忽发什么整理国故的兴会”,<sup>[63] (p308)</sup>甚至“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sup>[64] (p162)</sup>。“墨经校释”等工作就是这样开展起来的。而事实上,“任公才大工疏,事繁骛博,最不宜于考据。晚事考据者,徇风气之累也”<sup>[9] (p194)</sup>。连“新史学”的领袖都已被新朴学所俘虏,“新史学”本身的命运可知。推原溯始,我们不能不说,这一切均和胡适在留学时期即已形成的汉学偏好有关,在这个学术史上的“胡适之时代”(1917~1927),可以说胡适关注什么,学术界都会跟着热什么,“新汉学”就是这样一步步热起来的。陈寅恪说:“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sup>[65] (p513)</sup>“世局”转移如此,“学局”转移又何尝不是如此!

尽管胡适是“新汉学”运动的领袖,尽管“新汉学”运动以“红楼梦辨”与“古史辨”为形式进行得轰轰烈烈,但笔者必须顺便在此指出一个悖论:“汉学”在这时的所谓繁荣,其所昭示的并不是“中学”的复兴和辉煌,而是“西学”或“西化”的传播和深入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如同上面所说,尽管胡适在他那掀起“史学革命”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其他作品中谈校勘、谈音韵、谈清儒、谈国故、谈国学等等,但对读者的感受而言,胡适所谈其实都是“西学”或“西洋的史学方

① 唐德刚说:“在中国近代史上,士大夫最崇洋的一段便是民国初年那一段”,“那时的士大夫被洋人吓昏了头,对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那时的美国留学生才真是说一不二。连袁大总统想做皇帝也要以哥伦比亚大学的古德诺教授(Frank J. Goodnow)一言为定呢!”(见唐德刚:《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蒋梦麟也有同样的感受:“1909年前后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而且我们对中国的前途也很少自信”(见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79页)

法”。<sup>①</sup> 顾颉刚即说, 1917年胡适所带回来, 并对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是“西洋的史学方法”。<sup>[33](p76)</sup> “民国六年, 胡适之先生归自美, 讲中国哲学史于北大, 以西洋史学方法, 治中国哲学史料”, “然其所论列, 犹限于哲学史也”, 而自顾颉刚1923年发起古史论战后, “近世史学方法, 始应用于我国古史”,<sup>[55](p185)</sup> 古史研究面貌遂为之一变。文学研究上也是如此。胡在文学方面, 也作了不少考据文字, 如对《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传》、《西游记》、《醒世姻缘传》等书的考证, 而他所遵循的考证路数, 都是“西洋人研究文学史最初步的工作”。另外, 胡“又感觉到清代的朴学与近世西洋所谓科学方法相合, 遂以现代学术的眼光表扬清代的儒者的治学方法……这都于当时的治学的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影响”<sup>[56]</sup>。对于这一点, 胡有着明确的自我确认: 他说自己“关于整理国故的文字”, 关于历史考证和文学考证的方法, 都“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 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 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sup>[66](p348)</sup> 胡认为他的《文存》里最精彩的国学方法论包含了两个基本方面: “一个是用历史演变的眼光来追求传说的演变, 一个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sup>[66](p347)</sup> 而这两点, 全是“西洋的史学方法”。

笔者条举上述材料, 是为了回答下面这个问题: 在“西潮”汹涌的大势下, 为何会有“国学”的复兴? 上述材料告诉我们, “五四”时代的“国学”或“新汉学”实际上是以“西学”即“科学”附庸的面目和形式出现的。“新汉学”运动实际上是国学领域里的“科学方法”运动, “清儒”的被发现和“汉学”的被尊重, 实际上全拜“科学方法”之赐, ——清代的朴学之所以受到胡适这些“反传统”或“全盘西化”派的垂青, 全因为“清代的朴学与近世西洋所谓科学方法相合”。即如胡适自己所说: “在历史上, 西洋这三百年来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业绩; 中国这三百年来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sup>[67](p450)</sup> 人们这时在中国传统学术里寻找、挖掘“科学”的遗产, 实际上是在中国的文史之学中寻找西学的因素, 从而在中国的学术传统里寻找与西学的对接点, 这就如同后来人在明清的历史当中勘探寻找“资本主义萌芽”一样, 区别只在于, 后者是在把中国的历史西洋化, 而前者则是在把中国的学术西洋化, 也即当时所

理解的“科学化”。五四时代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时代, 如果说前者主要用来改造中国的社会, 那么, 后者在当时则主要用来改造中国的学术、特别是中国的文史之学了。这也就是说, “科学”并未在它本来的领域——自然科学——那里发挥应有的影响, 甚至在极力提倡“赛先生”的北京大学也是如此。在蔡元培出长北大期间, “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研究所”, 最后“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 相反, “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 比较的困难一点”。<sup>[68](p354)</sup> 而这个国学研究所之“国学”, 则是典型的“赛先生之‘国学’也”。<sup>②</sup> “科学”竟在离它最远的领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出现这种“种瓜得豆”的现象, 其故安在? 齐思和在1931年也曾对此作过说明: “新文化运动之目标, 本在提倡科学, 然十年以来, 我国科学无显著之进步, 新文化运动之成就, 反在文学与史学, 种瓜得豆, 殆非提倡诸公预料所及矣。窃尝潜思其故, 久之始以为文学史学, 夙为我国所擅长, 文学革命, 史学革命云者, 不过改革旧日之观念, 至其要素, 初无二致, 故其改革也甚易。至于科学, 原非中国所有, 其思想之程序, 研究之方法, 在于吾国夙昔之习惯相径庭, 加以书籍之缺乏, 仪器之不备, 进步云云, 谈何容易? 此岂近十年来中国学术惟史学文学特别发达之原因欤?”<sup>[55](p185)</sup> 总之, 以胡适为领袖的这场“新汉学”运动, 与“五四”的反传统精神并不相悖, 他们所践行的实际上是将汉学西学化, 人们这时所追逐的并不是“汉学”本身, 汉学实际上只是科学也即西学的“例”, 汉学的所谓繁荣, 是西学在中土长驱直入、更深一步的表现。一句话, 国学在这时只是西学已深入中国学术传统内部的表现而已。

## 五 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崛起与新史学的再生

“学局”的转移也和“世局”的转移一样, 可能具有同一个特征: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① 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附金岳霖审查报告。另见耿云志:《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北京国学研究所之‘国学’, 赛先生之‘国学’也; 无锡之国学专修馆, 冬烘先生之‘国学’也; 上海之国学专修馆, 神怪先生之‘国学’也。”见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下), 载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 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本, 第95页。

“新史学”虽被“新汉学”所斩杀，但“新汉学”在走过了自己的黄金十年后，也开始走下坡路，而促使它由盛而衰的一个因素，就是唯物史观派史学或“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崛起，——唯物史观派史学则完全可以看作是“新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学术语境中的复活。这一复活的始点，是“北伐”所引起的具体历史情势的巨变。“假如‘古史辨’运动可以象征五四的史学，那么中国社会史论战便可以象征北伐后的史学”，而“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sup>[56]</sup>在此之后，“新汉学”虽然仍在学界保持着主流地位，甚至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新汉学”才获得自己的典范形式，但谁都能看得出来，在变化了的社会语境中，最符合历史大势、最有活力、最有前途的已不是“新汉学”了。唯物史观派史学或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北伐后的崛起，是学术史家们公认的事实，已无须多说。问题是，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说它是“新史学”的传人？

敏锐的学术史家事实上早就看出了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周予同在引用了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四弊”、“二病”的批判和对“新史学”的界说后指出：梁氏的“全部史观建筑在进化论之上！而且不仅以叙述历史的演进现象为满足，并进而探求历史演进的基因，浸浸乎和最近的释古派的理论相近”！<sup>[52] (p539)</sup>周在讨论“释古派”时，又强调此派“喜为全面的通史研究”<sup>[52] (p555)</sup>，而由“考史变为修史”，——编修通史，则是为齐思和所反复提及的清末也即“新史学”时期“史学界的风气”。<sup>[27] (p245; p248)</sup>总之，在笔者看来，梁启超的“新史学”遗产的最核心部分几乎全部为唯物史观派史学所继承所光大，其中某些部分甚至被后者推向极端。具有启蒙主义性质的反传统历史观，是“新史学”和“唯物史观派”史学最大的共同点。政治上“反专制”、“反皇权”，思想上“反正统”、“反儒学”，立场上主张眼光下移，写国民的历史，写下层的历史，梁氏史观中这些所谓“反封建”的内容，均为“史观派史学”照单全收，并有所发展，甚至还造成极大流弊。<sup>①</sup>唯一的不同或差异，是后者将这些所谓的“反封建”内容统统纳入了新的“阶级论”的话语系统之中，从而使这些内容从“民主主义”一变而具有了“共产主义”的特征。譬如，传统史学的“四弊”中的首弊，在梁氏看来，是“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

家”，<sup>[1] (p279)</sup>梁氏的分析到此为止，现在，“史观派”史家则强调，“朝廷”本身即是国家，而“国家”本身则是阶级的，因此，虽然同是“反封建”，但是，梁更多地是从普泛的“人道”、“人性”出发，史观派则着眼于“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sup>②</sup>、特别是“地主阶级的罪恶”，“暴露”封建社会的“黑暗”。梁说“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姓之家谱”，翦伯赞说“二十四史”是“统治阶级的纪功录”；梁说“二十四史”是“君史”，翦则说“二十四史”是“专捧统治阶级而以人民为敌的历史”，<sup>[69] (p16~17)</sup>等等。尽管有这些差别，但“新史学”带有启蒙性质的历史观则为史观派全部继承下来，已为确凿无疑的事实。<sup>③</sup>

其实，对中国现代史学而言最有推动意义的事情，莫过于史观派对“新史学”“以社会科学治史”门径的继承和光大了。因为，“以社会科学治史”可以说是20世纪初年国际史坛上最富生命力的潮流，这一潮流在六七十年代结出了“年鉴学派”这一巨大的学术果实，最后一度递演覆盖了整个世界史坛。所以，当梁启超等人在20世纪最初几年呼吁引进社会科学学理治史时，不能不说他们是走在潮流的前面，即使对世界史坛而言也是如此。对此，许冠三评论道：“任公的眼光远大更是时下史界庸人难以想象。”早在近一个世纪前，第一，他即已留心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

① 大陆史学界1958年曾发生过一场以“厚今薄古”命名的“史学革命”，这场“史学革命”中提出的著名口号是“打破王朝体系”，建立一个“没有帝王将相”的“人民史体系”，具体做法就是：把帝王将相的活动、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以及传统史学十分重视的政治制度、政治沿革统统删除，王朝的始末也不加叙述，以把篇幅腾给“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可以说，上述这些极端的主张和做法，大都能从梁启超对传统史学“四弊”、“二病”的认知逻辑中推导出来，因为它们均属于反传统的启蒙主义史学一脉。有关1958年“史学革命”的情况，参见王学典：《1958：当代史学方向转换的一大枢纽》，《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201页。

②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初版“序”中，指出该书的两大题旨是：一是“揭露统治阶级罪恶”，二是“显示社会发展法则”。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范文澜全集》第七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③ 《中国通史简编》的“再版说明”中说：“人民的历史，不是皇族的家谱。历代纪元年号，显然以天下为帝王私产，且时代距离不易省察；故本书对历代帝王直称姓名，年次全用公历”（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范文澜全集》第七册，第5页）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对梁启超相关思想的继承或呼应。

系,“开今人‘科际整合门径’的先路”。其次,“是爱用各种学理作历史解析的纲领,尤爱引公理公例做推论和解说的凭借”。在多种学理中,梁“用得最多的是‘群学公例’和通观全局的‘社会学眼光’”,而经济学原理他更是经常援用,且“多用于析理近代国际关系”。许因此认为:“任公在这方面的尝试非但是现代史界的第一人,且为二千年来史学史上的第一人。”<sup>[23](p5,p43)</sup>如上所说,梁氏的这份“最有意义”的学术遗产也为“史观派”所继承所延续。不过,在继承这份遗产时,“史观派左翼”和“史观派右翼”的做法并不相同。<sup>①</sup>笔者多年前即已指出:以往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大发展本身实际上就是对“以社会科学治史”路线的实践。因为唯物史观本是一种社会学理论,更具体地说是一种冲突社会学,“阶级对抗”是历史的动力之类,就是这一社会学分支中的“公理公例”;用这一理论指导历史研究当然是一种“科际整合”。另外,迄今为止,对中国史学界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起源》所阐发的不过是盛行于19世纪的人类学理论,即单线进化的人类学模式。所以,《起源》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实际上也是早期人类学理论与历史学的跨学科实践。<sup>[70]</sup>至于马克思对经济史事实意义的强调和他的经济学理论及概念,特别是《资本论》对历史学家的启迪和支配,如在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讨论中所起的作用,那更是触目皆是,无须多说。在这一方面,“史观派左翼”的最大问题,是把梁氏作为学说的“公理公例”视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运动本身的“法则”和“规律”,以至陷入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泥沼。但追求“公理公例”与追求“历史规律”,在致思方向上毕竟是一致的,都更重视演绎而不是归纳,都属于“本质主义”的一脉。假如说上面所述主要是指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史观派左翼”的做法的话,那么,以陶希圣为代表的“史观派右翼”在这一方面似乎更自觉、更具开放性、更有代表性,这在陶氏所主办的《食货》杂志上有突出的表现。早在1935年年初,陶氏就断言:“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时代业已来临。<sup>[71]</sup>因此,他们高度估价社会科学理论在治史中的作用,认为历史研究所需要的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是不减于所寻找的材料的;有一分见解,才有一分材料,有十分见解,则有十分材料”,所以无论研究何种专史,皆须“有这种

学科的理论来指导”,“有外国的这种历史知识来作比照”。<sup>[72]</sup>譬如,在从事近代都市研究时,就应“先由[西方的]理论下手,根据这些理论来研究中国都市”,然后又“以研究中国都市所得,再来修改[西方的]理论”,<sup>[73]</sup>等等。由此可以看出,“食货派”已经在“以社会科学治史”的路线上走得很远了。更重要的是,由于“史观派右翼”比“史观派左翼”更少意识形态束缚,所以他们所用的跨学科理论并没有局限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框架之内,而是紧紧跟踪国际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最新进展,<sup>②</sup>因而,他们所获得的学术果实也更为丰硕。总之,梁启超当年所憧憬的“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的治史理想<sup>[1](p287)</sup>,已在“史观派”,特别是在它的“右翼”亦即“食货派”这里获得了比较充分的实现。

仅此两端,即从历史观到方法论,已足以说明,“唯物史观派史学”是“新史学”的变种或后裔,是“新史学”遗产的继承者。实际上,“史观派史学”与“新史学”的近似之处比我们这里所说的要多得多。譬如,如同上文所言,“新史学”具有比较明显的功利主义性质,尤其是具有比较突出的政治色彩,“新史学”家们呼吁“史界革命”,是从属于他们的救世需要,即把历史学纳入到他们的中国现代化改造工程中去。所以,“新史学”实际上是他们政治活动的副产品,基本上不带有后来职业历史学家治史的特征。在这一方面,“唯物史观派史学”与“新史学”可以说如出一辙,功利色彩更浓:“史观派”史家在自觉的层面上几乎全是革命家、革命党,史学在他们手中有时也只具有手段和工具的意义,他们的目光始终聚焦在社会革命上,“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sup>[74](p4)</sup>,是他们的治学追求。由此看来,“史观派”可以说继承了“新史

① 笔者把在民国年间,在现实政治立场上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社会革命的同时,又以唯物史观为治学工具的史家,看作“史观派右翼”;而把那些既运用唯物史观治史,又将这种治史活动与社会革命视为一体的史家称作“史观派左翼”。参见王学典:《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② 参看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一书中对《食货》杂志从1936年6月起,在新辟之“理论与比较”和“比较与参考”专栏中所刊发的一批重要文章的介绍与评论。(见该书第481~485页)这批文章可以说最能昭示中国“以社会科学治史”的前景。

学”的治史理念。更重要的是，“唯物史观派史学”还充当了“新史学”的遗嘱执行人。1926年，也即是由《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所导致的“新汉学”运动登峰造极之时，梁启超对他参与煽起的乾嘉考据学风有一个反省和检讨：“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史料”，另外，“还有一种史料钩沉的风气……近来史学家反都喜欢往这条补残钩沉的路走，倒忘了还有更大的工作”，他认为这是一种“病的形态”，而“病”源自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鼓励，他因此表示“我很忏悔”。经过这个反复后，他的治史主张这时又有点想往“新史学”路上回归：“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做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现在讲《中国历史研究法》特别注重大规模的做史，就是想挽救已弊的风气之意。这点我希望大家明白。”<sup>[75] (p313-314)</sup> 但是，为时已晚，三年后他就病故了。因此，他这里的新主张，可以视为他的“史学遗嘱”。而充当这个“遗嘱”执行人的，仍是“唯物史观派”。这个遗嘱的核心是：“新史学”所倡导的那种“大历史”或“宏大叙事”仍当继续。“唯物史观派”在更大规模上继续了这项事业。我们知道，在“新史学”时期，夏曾佑、刘师培等都新编了中国历史，梁启超已经着手撰写通史，连章太炎也有编纂通史的打算和设计，“新史学”家们在此前后还翻译引进了许多部通史类读物，所以，清末或19与20世纪之交，中国兴起了一个编修通史的热潮，这就是前引齐思和所言，“到了清末，史学界的风气，已由考史而变为修史”了。此后，“新汉学”兴起，史学界的风气，则又由修史变回考史，再往后，“新汉学”衰落、社会经济史学兴起，一个修史的高潮再次来临，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以及郭沫若后来所主编《中国史稿》的集中问世。此外，吴泽的《中国历史简编》、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等等，也都曾行销一时。在这前后畅销的通史著作还有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周谷城的《中国通史》、钱穆的《国史大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等。至于这些通史著作之间的差异，包括这一波通史编修与上一波通史编修之间的不同所在，不是这里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我们这里所要说明的一点是：“新史学”的“修史”传

统又恢复了，以“唯物史观派”为主要代表的此番通史编修再次改变了史学风气：由“尚专”走向“专”“通”并重，由“尚考”走向“考”“释”结合，<sup>①</sup>以宏观为导向的“综合概括”重新引起学界关注。

由上看来，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到形式，“唯物史观派史学”都继承了“新史学”的衣钵，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新史学”在被腰斩了近20年之后，又在“史观派”这里获得再生。这一再生，意义非同小可。——“唯物史观派史学”是公认的现代中国“以社会科学治史”学统中非常重要的、至少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新史学”在这里的所谓

① “古史辨派”在这时所发生的变化尤其具有突出的象征意义，可以视为此间学术风气正在变动的力证。顾颉刚在这时反省道：“抗战前的史学界，大家投向专的方面，而忽略了通的方面”，专家的研究“是史学界的基石，万万缺少不得”，“接受专家的成果，融汇贯通之后，送给一般人看”的通史读物也必不可少，所以，将来的史学应当“两条路都走，两种人才都培养，然后可以学尽其用”。（见顾潮编：《顾颉刚年谱》，1946年8月条，第327页）董书业这时也说：“抗战以后的史学有一个新趋势，便是一部分讲考订的史学家，渐渐注意于历史大势的研究，他们放弃了支离破碎的小考据，而去寻求通贯全史的新理论，这确是个进步的新现象……我个人受这个新潮流的激荡，最近的兴趣也移向通史理论的寻求。”对“史考”与“史释”，董书业这时也有深入认识，他说：“史学”的内容，从最大的门类而言，可以分为“考订和贯述二项”，“我们认为考订和贯述是两件不可偏废的工作，考订是审定史料，是写作历史的预备工作；贯述是根据已审定的史料，通论历史的大势，是史学的最大目的”，“现在中国的史学却偏在考订的一面”，“然而专讲考订，轻薄贯述，又岂是史学界的正常现象？”（见董书业：《从史料考订与通史著作谈到古史的研究》，《董书业史籍考论集》下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68、772页）而引起“古史辨派”发生上述变化的，正是“唯物史观派”通史著述的流行；最近“范文澜、翦伯赞们编的书各处畅销，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之争锋呢？”（《顾颉刚致白寿彝书》1947年9月23日，见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为了因应这种史学局面，顾颉刚、董书业等也开始了新的中国通史的撰写，直到被1949年的大变局打断（见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第229~230页）实际上，在周予同看来，中国史学界的风气从七七事变之后就开始了变化了，“撮取疑古、考古、释古三派的优点加以批判的综合”，在他看来已成新的学术征兆（见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9页）1943年，陈垣在介绍战时北平的学坛状况时，也感受到，“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注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重实用，推崇昆山顾氏；近又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见《陈垣致方豪书》（1943年11月24日），《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2页。



“再生”，是“新史学”汇入社会科学化治史洪流之中的重要表征。这也就意味着，“新史学”在被“新汉学”排挤或压倒之后，并没有就此死去，更没有消逝，其身影和灵魂依然活在现代史学的传统之中。尽管包括“唯物史观派”在内的以社会科学治史的这派学人“极少公开称引梁任公，不过，他们所信持的准则，实际有一部分早见于梁的史学新义之中”，这一“典范的若干‘基因’早蕴藏于任公史学新义之内”。<sup>[23] (p468~469)</sup>正是基于此，才有《新史学》一百年后，即2002年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的活动，这一活动旨在推动人们要继续沿着“科际整合”的“新史学”之路往前走；而且参加这一活动的据说有来自文史哲、政经法以及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九大学科的学者，这大概尤能体现梁氏引众多学科之公理公例入史的“新史学”要义。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说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并没有在拉开中国现代史学的帷幕之后就匆匆退场，更没有在随后崛起的“新汉学”的压迫之下和倡导者的纷纷背叛之下无奈消陨，相反，它早已以另外的形式进入中国现代史学的主流之中，并参与塑造了这一主流史学，因为它在它身上，代表着现代史学的一个光辉的有生命力的方向。正是这一方向，提供了近若干年中国史学走向国际学术大家庭的坚实基础。

## 六 结 语

归纳以上所述，笔者相信能获得以下几点看法：

1. 中国现代史学存在着“海外”和“本土”两个发祥地。中国现代史学是循着两条路径而不是一条路径产生、形成并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一条是由海外移植而来，一条是从本土经学亦即乾嘉学派一步步蜕变而来。由外烁而形成的史学就是典型的“新史学”，由内生而形成的史学，本文姑且称之为“新汉学”。由这种所谓的“路径依赖”所致，“新史学”此后就一直与海外史学的演变密不可分。“新史学”本身最初主要外烁于“东洋史学”，之后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则更多地接受了“西洋史学”的影响，——先是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继之以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史和唯物史观，再往后则接受了苏联史学的支配，至于近三十年，中国“新史学”派的后裔们

则又重新回到了西洋史学、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的轨道上，——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深入，每一步都和美国中国学的典范性导引密切相关。如同前文所说，这本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新史学”本身从“根”上起就含有西方史学的基因，——“以社会科学治史”为本质特征的社会经济史是西方的史学传统，它在中国出现，完全是横向移植的结果。所以它在此后的发展也不能不依靠“西方”，因为在“新史学”所研究的对象和问题上，“西方”总是先我们一步。如果说“新史学”从一开始就眼光向外的话，那么，“新汉学”从一开始就立足本土，特别是本土的典籍考订。因为典籍考订、古典整理在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至少从孔子即已发端，到汉代则进入第一个高潮，“现存的古书莫非汉人所编定”。直至清代，由秦火和年代久远所造成的古籍的错简残缺才基本达到可读的程度，“清代三百年的学者已把古书整理的很清楚了”。但“清代学者信而好古，他们在‘汉人近古，其说必有所据’的前提下工作”<sup>[7] (p239; p241)</sup>，所导致的是汉学特别是东汉之学的复兴。用西汉之学打破东汉之学，进而再用战国之学打破西汉之学，“用了典籍考订学的工具冲进圣道王功的秘密窟里去”，从中“夺出真正的古文籍”，以“替典籍考订学家恢复许多旧产业”，<sup>[77] (p209)</sup>则是“整理国故”运动特别是“古史辨”的宗旨所在。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新汉学”主要指的就是这种源远流长、再度复兴的“典籍考订学”。所以，“新汉学”对中国传统而言，基本上是一种顺流而下的东西，立足本土，当是它必然的选择。所以，“新汉学”在一般的意义上指的就是“典籍考订学”，在史学的意义上则是“史料（籍）考订学”。总之，“新史学”和“新汉学”作为两条史学路径，就基本的方面而言，一条是国际路径，另一条则是本土路径。最终的归宿，前者要求预流国际社会经济史学，后者则要么向传统的欧洲汉学，特别是“巴黎汉学”看齐，要么干脆希望“回到乾嘉去”。

2. “新史学”和“新汉学”是中国现代史学演进的两条基本路径。这两条路径起初各有轨辙，齐头并进，但由于“新汉学”凭借深厚，所以，在五四之后一段时间内，它压倒了“新史学”。但由于“新史学”符合社会历史潮流、国际学术潮流，所以，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起，特别是到了40年代，它又后来居上，再立潮头。说“新史学”

符合社会历史潮流,主要是指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帝王体制的覆灭,随着“五四”时期“劳工神圣”口号的提出和“平民主义”观念的普及,尤其是随着“工人罢工”和此后的“湖南农民运动”在历史舞台上的出现,普通民众的作用于是被发现,民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因此同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历史的范围扩大了,历史的基础雄厚了,历史民主化了”。<sup>[56]</sup>与这一点相应,发生在西方的下述变化也以同样的逻辑在现代中国展开:“在经济方面,工业革命的发生和进展,使西洋由中古式的农村经济社会踏进了近代工商社会。马克思看出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对于文化进展的重要性,创唯物史观学说,指出了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历史学家受到了时代思潮的影响,渐放弃以前专以政治军事为主的历史而以经济的发展为主要的脉络了。”<sup>[56]</sup>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显然也以经济事实特别是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对日常生活的日益显著的改变作用为基础。随着现代化因素的增多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随着机器大工业优势的显现,必然是学界对经济因素、生产工具作用的重视,这样,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出现和繁荣就是难以阻挡的了。而研究经济史、社会史及其他相关的历史,不能不借鉴、参考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及其他相关的“公理公例”,这样,“以社会科学治史”潮流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阻挡的了。总之,如果说,“新汉学”的凭借是中国的学术传统本身的话,那么,“新史学”的凭借则是社会历史大势。另外,如同前文所说,无论是“新史学”还是“新汉学”,都离不开国际学术潮流的范导,而20世纪初年的国际史学潮流正在发生巨变。“现代史学近百年来一马当先的是社会经济史。”<sup>[24](p148)</sup>“自从19世纪末年以来”,历史研究的“重点已经转移到经济史和社会史”,<sup>[78](p185~186)</sup>有学术史家甚至断言:“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法国的、比利时的、美国的、斯堪的那维亚的、甚至于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就已经开始批判兰克式的范型,并召唤着一种能解说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历史学了。”<sup>[79](16)</sup>这说明,整个20世纪的国际学术潮流是“有利于‘新史学’而不利于‘新汉学’的,且不说‘新史学’本身就是这一潮流的产物了。‘新史学’后来以唯物史观派史学为形式的东山再起,看来绝非偶然。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在此指出:在整个民国期间,‘新汉学’始终处于主流地

位,发挥着支配性影响,“新汉学”取代过“新史学”,但“新史学”后来无论声势多么巨大,都未曾再取代过“新汉学”,只是对“新汉学”的地位造成过若干冲击和威胁而已。这也就是说,“新史学”和“新汉学”尽管在20世纪都各有起源各有轨辙基本平行,但并非没有主次之分,“新汉学”学派和“新史学”思潮始终掌控中国史坛这一局面,直到1949年才得以终结。

3. 当代史学的发展和蜕变,仍以“新史学”和“新汉学”为背景。“新史学”和“新汉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演化和沉淀,如今已经发生深刻蜕变并各有归宿。也就是说,在当今的史学界或学术界,我们已经难以寻觅当年典型的“新史学”和“新汉学”。这两种史学形态已经融入到当代的知识形式中去了。包括当年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今也已面目全非,很难指认。具体说来,由梁启超所开创的“新史学”,中经“唯物史观派史学”,如今已经开花结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区域社会史研究”、“乡村社会史研究”、“历史人类学研究”、“新社会史研究”和“新文化史研究”等史学分支中,尽管如前文所言,这些史学分支大都受到海外中国学、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的强烈范导,但也必须看到,这些史学分支也大都秉承了“唯物史观派史学”的遗产:第一,“经济”是社会历史变化的初始因素,仍是眼下各类经济史学的基本预设;第二,写“自下而上”的民众史、民间史、社会生活史,仍是各类社会史研究者的工作旨趣;第三,从具体的研究路径看,各类社会史和各类经济史,均以国际上尤其是欧美学者所发现的“公理公例”为“参照”,来探讨中国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换句话说,在“归纳”与“演绎”这两条路径中,他们与那些先驱者们一样,更偏重于以“公理公例”为依据的“演绎”,——“以社会科学治史”或“社会科学化史学”,从根本上讲,所遵循的只能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路径。而这一路径的最初开辟,不能不追溯到梁启超的“新史学”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或“唯物史观派史学”。

如同“新史学”已经严重分化与蜕变一样,“新汉学”所发生的变化也同样深刻和剧烈。在当今的中国文史学界,已经没有人继续认为文史研究应该“不立一真惟穷流变”,专注于文献了,尤其是已经没有人继续主张“史学就是史料学”

了。那么,胡、顾、傅当年所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新汉学”运动又流到哪里去了呢?看来它也同样分化到若干具体知识门类中去了。这里当然牵涉到对“新汉学”边界的把握。“旧汉学”的整体特征,即如前文所言,是以“文本”、特别是经学文本为中心的考据,“新汉学”则对这种“文本考据”有若干重大拓展,其中最突出的,是他们在“文本考据”的基础上,形成了对中国思想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的系统研究,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等。所以,在当代的知识门类中,学术史、思想史特别是其中的儒学史等学科或专业更多地接受并承传了“新汉学”的遗产和治学路数,包括“新汉学”的质朴学风,也在这些知识门类中得以延续;一并被延续下来的当然还包括“在文本上打转转”和“重知识轻思想”的治学局限。与学术史、思想史相比,笔者感到,“新汉学”最富有象征性的学术遗产事实上已经归并到当今的“古籍整理”和“史料学”学科中来了。<sup>①</sup>也就是说,当今的“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专业所致力“古籍整理”工作,以及与这种“古籍整理”相关度较高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辨伪学、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金石学、年代学、史源学等等,可以说是当年“新汉学”事业的主体部分。而“古籍整理”及其辅助学科仅是今天的文史学术大框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文史研究的初步工作,文史研究的主体部分应是对古典文献所著录所附着所反映的原始事实和观念事实的探究。严格说来,就此而言,到了今天,“新汉学”的“古籍整理”和“史料学”的学科属性才大白于学界。两汉时期的“经学”、乾嘉时期的“乾嘉汉学”、五四时期的“新汉学”所致力文献整理,则一直被视为所在时期的学问的全部,至少是被视为学问的主体。历史地看,这本无可指责,特别是在“两汉经学”和“正统汉学”当令时期,因为除此之外,当时基本上没有其他学问可言。但最晚到五四前后,情况即已发生了巨变:“文本考据”已变为现代学术构成中的一个部分、治学过程中的一个初始环节,在“文本考据”之外和之后,一个更大的学问世界已经显露出来,这就是对“文本”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生活本身的研究,——梁启超“新史学”所面对的主要对象。面对这一学术变局,当时的一部分人,如梁启超、郭沫若、陶希圣等立即投身到了新的研究中去,开辟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

新领域;另一部分人如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则以特有的傲慢和自负,想方设法坚持“文本考据”的正统地位和主流身份,淡化甚至鄙视对社会生活的研究。——直至今日,一些视“文本考据”为学问正统的学人仍对“社会史”等相关研究持有这份“傲慢”和“自负”。但撇开这种“路数偏见”不谈,我们必须承认,如同“两汉经学”的主要业绩是整理和编辑文献,“乾嘉汉学”的主要业绩是“整理古书”一样,“新汉学”的主要业绩也是传承古学,并在“历史演进观”的指导之下致力于文献年代的考订和相关史实的清理,煌煌七大册《古史辨》,是这一方面业绩的结晶和标志,也是“新汉学”典范的集中展示,更是今天“古籍整理”的先驱,——虽然今天的“古籍整理”已走向更技术化更专业化更形式化的道路。

4. 史学的最高价值是对历史本身的研究。“新史学”和“新汉学”不仅是中国现代史学产生和演进的两条路径,也不仅是既各有所长又互相激荡的两种史学形态,——它们本身并非互相外在乃至无法兼容,实际上,它们可能还分别代表了一个完整的现代史学结构的两翼:一是历史研究的新范式,一是文献整理的新范式;一重依据“公理公例”的“演绎”,一重“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归纳”;一在历史本身的探究,一在历史知识的检讨;一在开辟新途接轨国际,一在传承古典上接传统。因此,虽然在势头上两者可以此消彼长,但在本质上,实乃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尽管如此,这两翼之间似乎仍有轻重缓急主要次要直接间接之别,历史研究必须以研究历史本身为依归,对文献的清理和辨证,最终是为了捕捉隐蔽在文献背后的事实和相关的历史文化信息。应该看到,“新汉学”所致力“古籍整理”、“文本考据”和众多的“史料学”范畴内的工作,包括传统的“欧洲汉学”、特别是“巴黎汉学”的研究内容,仍会长久地甚至永远地存在下去,——以“文献”为中心的各种工作事实上是没有止境没有尽头的。但毫无疑问,以“文献”为中心的各种工作不应成为现代以来史学的主流和正统,不应成为现代史学的最高价值。因为虽然史学离不开“文献”和“史料”,但史学毕竟不是

<sup>①</sup> 胡适早把“乾嘉汉学”的主要业绩概括为“有系统的古籍整理”。见《胡适的自传》,见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册,第215页。

“史料学”和“文献学”。历史研究的根本宗旨是从属于对历史本体的说明和调查,是对研究对象的过去和现在作出贯通性解释,若能从中抽象出具有普适性意义的“公理公例”当属最高境界。在这一方面,胡适晚年弟子唐德刚对作为“新汉学”领袖胡适的反省,对我们这里所谈论的问题可能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唐氏认为:“史学里本有‘史实’和‘释史’两个重要部门。史学家治学的目的第一便是在追求真实的历史;第二便是把可靠的历史事实‘概念化’,以期逐渐摸索出历史事实演变中可能存在的‘客观规律’。”<sup>[80] (p1)</sup>唐氏据此得出,当年“胡适的正当工作,应该是在新兴底社会科学的光芒照耀之下,把三千年中国的历史经验作一总结,从而抽出一条新的东方法则来,以成一家之言。然后有系统地引导我们底古老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将来”<sup>[24] (p58)</sup>。但胡氏不作此图,却搞起“拿证据来”的学问来!可它所研究的学问并非历史本身!“适之先生在史学上的弱点便是他老人家‘因噎废食’,过分看重‘方法学’而忽视了用这‘方法’来研究的‘学’本身。一个史学家如果搞来搞去搞不出‘拿证据来’这个圈子,那他底史学研究的范围也就很狭隘了。”<sup>[24] (p147)</sup>唐德刚的结论是,“胡适这支部队”的“落伍”,是因为统帅们对“赫胥黎以后的‘社会科学’……连皮毛也未碰过”<sup>[24] (p157-158)</sup>。尤其是“对‘经济学’这门重要的‘行为科学’的知识是一团漆黑;而现代史学近百年来一马当先的正是‘社会经济史’这一学派!”<sup>[24] (p148)</sup>唐德刚这里的看法是否准确另当别论,我们只想借此指出,“新史学”和“新汉学”尽管可以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在性质上仍有若干不容忽视的差异。

####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 新史学 [A]. 梁启超选集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2] 梁启超. 变法通议·论译书 [A]. 梁启超全集: 第一册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3] 邓实. 史学通论 [J]. 政艺通报, 第 12 期, 1902-08-18; 第 13 期, 1902-09-02.

[4] 陈黻宸. 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 [A]. 陈黻宸集: 下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5] 横阳翼天氏(曾鲲化). 中国历史 [M]. 上海: 东新译社, 1903.

[6] 蔡元培. 中国哲学史大纲·序 [A]. 中国哲学史大纲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7] 蔡元培. 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 [A]. 蔡尚思主编.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 第一卷 [C].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社, 1982.

[8] 梁启超.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9] 张荫麟. 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跋《梁任公别录》 [A]. 李洪岩编. 素痴集 [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10] 钱基博. 国学文选类纂·总叙 [A]. 曹毓英选编. 钱基博学术论著选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11] 恒慕义. 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 [A]. 古史辨: 第二册 [C].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5.

[12] 林同济. 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 [J]. 战国策, 第 14 期, 1940-11.

[13] 周谷城. 中国史学史提纲 [A]. 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14] 童书业. 新汉学与新宋学 [A]. 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 下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15] 熊十力. 读经示要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6] 熊十力. 十力语要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17] 熊十力. 十力语要初续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18] 齐思和. 现代中国史学评论 [J]. 《大中》, 第 1 卷 1 期, 1936-01.

[19] 牟润孙. 记所见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 [A]. 杜维运, 黄进兴. 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 第 2 册 [C]. 台北: 华世出版社, 1976.

[20] 邓嗣禹. 近 50 年的中国历史编纂学 [J]. 李扬眉, 周国栋译. 山东社会科学, 2004(6).

[21] 蒋俊. 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进程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22] 王汎森. 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 [A]. 罗志田编.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 上 [C].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23] 许冠三. 新史学九十年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3.

[24] 唐德刚. 胡适杂忆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2.

[25] 胡适. 胡适的自传 [M]. 葛懋春, 李兴芝编.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 下 [C].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26] 余英时. 重寻胡适历程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7] 齐思和. 晚清史学的发展 [A]. 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 [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7.

[28] 傅斯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A]. 欧阳哲生编. 傅斯年全集: 第三卷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29] 罗尔纲. 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30] 杜畏之. 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 [J]. 读书杂志, 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 1932-03.

[31] 王国维. 再与林(洁卿)博士论洛诰书 [A]. 观堂集林: 卷一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32] 傅斯年. 史料与史学发刊词 [A]. 欧阳哲生编. 傅斯年全集: 第三卷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33] 顾颉刚.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A].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34] 李伯重. 理论、方法、发展趋势: 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35] 钱大昕. 十驾斋养新录: 卷十三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

- 社, 1996.
- [36] 王鸣盛. 序言[ A ]. 十七史商榷[ 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 [37] 陈垣来往书信集[ Z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38] 顾颉刚. 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 A ]. 中国新文学大系: 第十集[ C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近代史资料: 总 91 号[ Z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40] 胡适. 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精神订误·附识[ A ]. 陈崧编.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增订本)[ C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41] 胡适. 井田辨[ A ]. 欧阳哲生编. 胡适文集: 第二卷[ 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42] 胡适.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A ]. 古史辨: 第一册[ C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43] 顾颉刚. 古史辨第三册自序[ A ].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 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44] 顾颉刚.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A ]. 古史辨: 第一册[ C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45] 顾颉刚. 答李玄伯先生[ A ]. 古史辨: 第一册[ C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46] 胡绳. 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 A ]. 枣下论丛[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8.
- [47] 傅斯年. 史学方法导论[ A ]. 傅斯年全集: 第二卷[ M ].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 [48] 胡适. 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 A ]. 中国新文学大系: 第十集[ C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 [49] 刘起舒. 顾颉刚学述[ 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50] 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51] 《万国史纲》再版广告[ N ]. 中外日报, 1904-03-24.
- [52] 周予同. 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A ]. 朱维铮编.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 M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 [53] 蒙文通. 经学导言[ A ]. 经史抉原[ M ]. 成都: 巴蜀书社, 1995.
- [54] 胡适. 再版自序[ A ]. 中国哲学史大纲[ 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55] 齐思和. 最近二年中国之史学界[ A ]. 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 M ].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7.
- [56] 齐思和. 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J ]. 燕京社会科学, 1949(10).
- [57] 余英时.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M ].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 [58] 崔述. 洙泗考信录自序[ A ]. 崔东壁遗书[ 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59] 柳诒徵. 中国文化史: 下[ M ].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86.
- [60] 余英时. 重寻胡适历程[ M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61] 陈平原.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62] 胡厚宣. 我和甲骨文[ A ]. 张世林编. 学林春秋[ C ].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63] 吴稚晖. 箴洋八股化之理学[ A ]. 科学与人生观[ C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 [64] 周善培. 谈梁任公[ A ]. 夏晓虹编. 追忆梁启超[ C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
- [65] 陈寅恪. 朱延丰突厥通考序[ A ].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 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66] 胡适.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A ]. 葛懋春编.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 上册[ C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 [67] 胡适. 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A ]. 胡适文集: 3[ M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 [68] 蔡元培.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A ]. 蔡元培选集: 六[ 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69] 翦伯赞. 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 A ]. 史料与史学[ 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 [70] 王学典. 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 J ]. 中国社会科学, 1994(2).
- [71] 陶希圣. 食货学会本年(1935)六项工作草约[ N ]. 食货, 第 1 卷第 6 期, 1935.
- [72] 高耘晖. 分工研究的方法[ J ]. 食货, 第 2 卷第 2 期, 1935.
- [73] 吴景超. 近代都市的研究法[ J ]. 食货, 第 1 卷第 5 期, 1935.
- [74] 翦伯赞. 历史哲学教程(修正再版)[ M ]. 桂林: 新知书店, 1939.
- [75]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 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76] 顾颉刚. 古史辨第四册顺序[ A ].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 C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77] 顾颉刚. 古史辨第二册自序[ A ].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 C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78] 沃尔什. 历史哲学—导论[ M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 [79] 伊格尔斯.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M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 [80] 唐德刚. 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在中国留学生历史学会成立会上的讲话原稿[ A ]. 史学与红学[ M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收稿日期 2008—03—04

作者王学典,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 殷 铭】